

一、價值涉入的正面意義

社會學傳統裡，比較研究一向受到肯定與重視。譬如 Durkheim(1993: 124)《社會學方法規則》(*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*)曾不止一次表示：「比較方法是唯一適合於社會學的」、「比較社會學不是社會學特殊一支；這就是社會學本身——當它中止成為純描述事實且嚮往分析之時」(Durkheim 1993: 137)。同輩的 Max Weber 更將畢生大半精力投注於比較研究上，不論是《經濟與社會》(*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*)、《宗教社會學論文集》(*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*)，還是較早的《世界性宗教之經濟倫理》(*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*)都是顯著例子。即使到了晚近歷史社會學研究，¹科學客觀性要求的夢魘——以比較方式來化解——同樣揮之不去。理由很簡單，只要分寸拿捏稍有不慎，尤其牽涉到文明比較問題時，研究爭議性也會隨之擴大。直到現在為止，指責 Weber 作品裡關於歐洲／西方中心主義之論述幾乎未曾停歇過。

另一方面，認同研究在台灣起步雖晚，但發展迅速。也就是說，「我是誰？我是什麼人？」此一問題普遍受到書寫者青睞。以此，作家本人、筆下影射虛構人物、政治受難者、遺民等這些微渺「個人」的「家國之思」，都成為刻劃某一時代認同不可或缺的元素。特別是自解嚴以後，過去受到壓抑的聲音逐漸為人所知，其中文學作品裡的隱喻破解更成為研究者的最愛，「八〇年代以來，國族認同議題經常在文學領域中激起重大爭辯，而文學也一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建構國族認同的重要文化領域之一」(蕭阿勤 2008: 388)。易言之，文學是一種政治敏感度很高的語言，

¹ 例如 Moore (1966/1992)《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》(*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: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*)或者 Skocpol (1979)《國家與社會革命》(*States & Social Revolutions: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, Russia, & China*)。

不僅允許吾人一窺過去，還可以連帶感受、接觸到某種隱含理念。在研究者特意展現下，各式各樣的文學娓娓吐露出不同「真實／真相」，統獨立場上的文學發展史觀一應俱全，如陳映真、陳芳明、游勝冠等人即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此外，較不涉及立場表達、從學術流派出發研究認同的學者迭有出現，如早期的陳光興(1994)〈文化研究〉、晚近的盧建榮(1999, 2003)〈新文化史〉是較為著名的例子。²

雖然在文學場域裡，「認同研究」可說是如魚得水，但這並不能因此表示只有或只能透過文學作品形式，才能提出認同問題。事實上，文本後設的解讀存在著其他更為隱密的形式，只不過數量上較不顯著，其重要性卻不可小覷：它們的滲透方式可能更為迂迴、有效。以社會學為例，趙剛(1996)的國族主義批判（「關於認同研究之研究」）、同年張茂桂(1996)的反駁意見（「研究中的認同」）堪稱經典。數量較少，主要可能是因為一是不易察覺，二是違反直覺：要從客觀論證與解釋中分離出價值元素，本身即是一種矛盾，因為這兩者間的關係似乎是充滿緊張的。

然而，對於 Weber 的讀者而言，價值對於個體的重要性，應是耳熟能詳的。不論行動(*Handeln*)³的界定，或者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行動科學所引出的理解(*verstehen*)、詮釋(*deuten*)及解釋(*erklären*)概念，還有四種行動類型中的價值理性(*wertrational*)行動，甚至學術與政治之間取得平衡，吾人都能看到行動者價值投射，扮演著一種無可忽視的關鍵角色。看在 Aron(1967: 503)眼裡，Weber 強調近代科學、特別是社會科學特徵之一在於本質上未完成性(*l'inachèvement essentiel*)一事，其原因即在於作為起點的個別不同價值存在。接下來的問題，便是如此主觀感受（既然它如此重要）如何轉變成為客觀性研究的對象；亦即研究不僅如何避免被價值所操弄扭曲，還可以妥切分析負載著價值的作品。為避免價值判斷——若以 Weber(1895/2004)方式來說，那就是科學研究盲目套

² 至於文學與政治之間在敘事上的關聯，蕭阿勤的一系列研究不容錯過。

³ 「行動個體對其行為賦予主觀的意義」(Weber 1921/1993: 19)。